

第三章 三馬之間——馬寅初思想探析

如果扣除那些在北京大學等校園中純粹口號式、戴帽子式的大字報批判，那些真正有立論、有觀點的批判文章，往往在其立論中，企圖論証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團團轉理論」等不是「馬克思主義」，甚至認為是「馬爾薩斯主義」。就如本文第二章所指出的，如何將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想法馬克思主義化，始終是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念念不忘的事。當時的中國大陸，一旦某一個知識份子提出某個看法，卻被人指為不是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那麼他的學術生涯就要遭受到不小的衝擊。這方面的衝擊姑且不論，如果細細分析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立論根據，不但有助於進一步了解馬寅初的思想，同時也可以了解當時中國大陸學政界對於「什麼是學術研究」、「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馬爾薩斯主義」的理解。畢竟中共是以馬克思所揭櫫的社會主義理念作為其建政基礎，然而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共的學者所認知的馬克思主義是否正確？如果這些批評者所認知的馬克思主義也是不正確的，或者是片面的，那麼，這些爭議的背後，或者說，誰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到底是由什麼決定的？難道只要是黨員的詮釋，便是馬克思主義的，非黨員的詮釋，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那麼，是權力，還是真理，在對此下判斷？

其次，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地位，不但是一種唯一正確的理解人類歷史發展的研究取向，同時也是中共建政時的決策思考起點，自不待言，問題是，馬爾薩斯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國為何具有如此的負面形象？馬寅初對於馬爾薩斯主義的態度，從他所發表「新人口論」的相關著作當中可知，也是採取批評態度的，可是他卻一再被指斥為馬爾薩斯主義者。為何一個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在講述自己的人口和經濟理論時，必須與馬爾薩斯如此明確地劃清界限？以馬寅初而言，1955年他首次在浙江人大小組會議提出他的觀點時，就被與會者指為「與馬爾薩斯有何兩樣」，因此，或許這個問題可以這麼問：馬爾薩斯理論，到底在近代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形象？

循著上述思路，本文將首先剖析馬爾薩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近百年來中國的命運，並從馬寅初的學思歷程及主要著作論點出發，了解他的思想傳承如何影響他對這兩大思潮的態度，同時也將針對幾位批評馬寅初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進行檢視分析。

第一節 馬爾薩斯主義在中國的處境

馬爾薩斯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最早可追溯自清末時期。1880年，美籍傳教

士丁韋良 (William A. P. Martin) 與汪鳳藻翻譯出版了第一部西方經濟學**富國策**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作者福塞特 (H. Funcett)，其中介紹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 (當時被譯為「民數論」)。這本西方經濟學的著作，對於馬爾薩斯理論頗為讚賞，先後有許多版本刊行於世，並被一些報刊摘要轉載，因此，馬爾薩斯理論日漸為中國所悉。¹此外包括梁啟超、嚴復等清末民初重要的西方思想引介者，都曾提及馬爾薩斯及其思想。

馬爾薩斯理論在歐美其實是，或者說，已經是倍受責難的。除了他在書中對於人類文明前景的悲觀看法之外，尤其，不論是保守派的教會人士，或者是激進的改革主義者，都對馬爾薩斯關於 1795 年以來英國濟貧法的批評感到道德上的憤怒。馬爾薩斯認為，任何的濟貧措施，並未使得社會總生產物的增加，反倒使得受救濟的貧民不怕沒飯吃，更加激起他們結婚生子的念頭。如此一來，「濟貧法將會創造出新一批它所養活的窮人」。不但貧民生活水準未見提升，連帶地「也使較為勤勞和較為優秀的社會成員減少他們本來應得的份額，從而將使更多的人走上不能自立的道路」。²這些論調所引來的批評，多不勝數。³但是在西方，由於他是人口研究的先行者，因此儘管批評者眾，仍無損他在人口研究上的地位。

在此之前，中國內部對人口問題並不是沒有人留意，但流傳不廣。早年明朝中葉，徐光啓即已注意到，中國的人口，大約是三十年成長一倍。⁴乾嘉時期的洪亮吉，以及比洪亮吉稍晚的汪士鐸，都認為中國的人口過多，以至於貧困農民人數始終無法減少。

洪亮吉指出，盛清治世已歷百年以上，人口增長的情形是「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幾代之後，任何家族都成了「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的情況，再過一、兩代，勢必「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再這樣下去，「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饑寒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乎」？至於人口增長如何解決，洪亮吉認為，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盡力開荒墾地，減免賦稅，則為君相調劑之法。⁵儘管洪亮吉並未直接提到民變和革命與此一問題之關連性，但人口與糧食之間的關係，卻已經清楚點出。

¹ 林毅夫，胡書東，「中國經濟學的百年回顧」，**學術批評網**，<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6484&type=1008>。不過，筆者遍查各處，不知本書原作者福塞特之全名及詳細資料。

² 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ed. By Donald Winch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6-58.

³ 詳見 Kenneth Smith, *The Malthusian Controversy*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Michael E. Turner, *Malthus and His Tim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⁴ 陳嘉珉，「中國的『馬爾薩斯』——汪士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2年7月，總第4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03065.htm>。

⁵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遺集**（台北：華文書局，1969），頁33-34。

人口數量的消長和糧食之間的關係，甚至引伸到前現代的國家與社會的政治穩定與否（即民變和革命的起因），一直以來存在著爭論。汪士鐸身處太平天國興衰之際，家人又在此一事件中離亂死亡。他把太平天國的起因看成是過剩人口所造成的動亂，即把世亂之起因，歸結為人口本身繁衍過速過多，造成糧食緊張所致，而非貧富不均或是官逼民反所致。在他看來，人口之所以過多，是由於「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禍亂」，因此他強烈鼓吹「治民須欲民富，欲民富，當首行溺女之賞」。除此之外，他還提出嚴格限制婚姻資格（非富不能娶）、推廣避孕（即「冷藥」）、處罰多生（倍其賦）、鼓勵晚婚等主張，這些手段全都是人為的方法，在馬爾薩斯的分類方式而言，是屬於「預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至於戰爭，汪士鐸則是積極主張人為地使用戰爭來消滅現世的過剩人口（過剩人口在汪士鐸看來即是「作亂者」）。⁶

從上述比較可知，洪、汪二人的看法與馬爾薩斯在許多問題上的看法不謀而合，尤其是關於農民貧困的原因。而汪士鐸對於世亂之因與人口增長的關係，則比洪亮吉更為直接的連繫起來，這與傳統的「土地兼併」、「官逼民反」等人謀因素說法不同，而更加強調了自然力的作用。如此一來，貧窮或社會不公的問題不是以革命手段可以解決的，而是窮人生殖太多太快、糧食增長不及所致，因而洪、汪二人常被大陸學界稱為「中國的馬爾薩斯」。⁷但是洪、汪等人的思想，當時並未傳播開來，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對人口問題也不甚重視。真正的廣為人知、造成影響，還是要到清末留外學生回國之後。

陳長蘅、孫本文、陳達、許仕廉等人，這些與馬寅初大致是同時期或稍晚出國留學、學成歸國的學者，在 1920-30 年代，都曾經在其任教的學校中教授或宣揚人口理論和中國人口問題，並多以馬爾薩斯理論為藍本，同時也先後提出了人為控制人口的辦法。⁸其中陳達在 1926 年於清華大學開設人口問題課程，又辦報刊宣講人口問題，並邀請過美國的計劃生育倡導者山額夫人（Margaret Sanger）到中國，到北京大學演講（由胡適擔任現場翻譯）。這些作為才真正開啓了馬爾薩斯理論和人口問題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討論。也正是如此，使得民國初期中國學界關於人口問題的和概念，一開始便以馬爾薩斯理論為本進行研究和討論，並且同樣成為人口研究中的學術典範（paradigm）。有別於西方社會，馬爾薩斯理論初來中國，其被對待的態度，肯定遠大於否定。

馬爾薩斯理論來到中國會受到學界那麼大的歡迎，與其說是這些學者欣賞馬

⁶ 汪氏關於人口問題的看法，詳見汪士鐸，*乙丙日記*（卷三），鄧之誠輯錄（台北：文海，1967）。

⁷ 如陳嘉珉，「中國的『馬爾薩斯』——汪士鐸」；王新華，「洪亮吉，中國的馬爾薩斯」，*經濟師*（北京），2001 年 9 月，第 9 期，頁 251-252。洪氏之說，論時間而言，比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初版還早五年，類此之觀點，還包括了清末的龔自珍、湯鵬等人。

⁸ 詳見陳長蘅，*中國人口論*（上海：上海書店，1992）（初版於 1918 年）；孫本文，*社會學大綱*（上海：上海書店，1992）（初版於 1932 年）；陳達，*中國人口問題*（上海：上海書店，1989）（初版於 1934 年）；許仕廉，*中國人口論*（上海：上海書店，1991）（初版於 1930 年）。

爾薩斯理論，還不如說是中國多年來內外戰亂的處境，使得這些學者多半循著馬爾薩斯的理路思考中國的問題。然而身處同樣的中國，卻有一批人對馬爾薩斯理論是反對的，其中最大的批評力量，就是亟思以政治革命改變中國命運的一群人，先是孫中山，後是馬克思主義者。

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的系列演說中指出，觀諸歷史，歐美日各國之所以走向帝國主義，便因百年多年各國人口激增，要爭生存空間。中國人口雖多，但百年以來未見增長，歐美日各國（法國除外）人口雖少，但百年來人口卻以數倍、數十倍的速度增加。長此以往，加上歐美日各國的殖民政策，中國將會有亡國滅種之危險。他特別提到法國的情況，並連帶地批評了馬爾薩斯：

百年前有一個英國學者，叫做馬爾賽（薩）斯，他因為憂世界上的人口太多，供給的物產有限，主張減少人口。曾創立一種學說，謂：「人口增加是幾何級數，物產增加是數學級數。」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剛合他們的心理，便極歡迎馬氏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累，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賽（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賽（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賽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⁹

縱觀孫中山對馬爾薩斯的批評，並非對其理論本身的邏輯性提出質疑，而是憂心一旦馬爾薩斯的節育思想在中國發生影響，中國人口再不增長，日後將會有亡國滅種之虞。這是從種族或民族發展和生存的角度而言的。與此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

馬克思本人對馬爾薩斯的印象極壞，除了理論上的批評、道德上的責難，還對此人的學術研究態度提出批評，認為他犯了嚴重的著作剽竊。¹⁰ 其它問題姑且不論，理論層面，他認為，所謂的人口過剩，始終指的只是社會的下層，上層是不會過剩的，因為上層社會有多少人就養得起多少人，因而所謂人口過剩的問題，其實是指責窮人太多的另一種說法。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而言，過剩的工人人口（失業者）對資本主義發展來說卻是必要的：一方面，它作為產業後備軍，當資本積累擴大、需要馬上就可加入的勞動力時，這些過剩人口就可以補上；另一方面，即使資本不擴大，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會拉低工資水準，一旦工人要

⁹ 孫中山，**三民主義**（台北：三民書局，1999）頁8。

¹⁰ 詳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90-391；676-678。

求增加工資，這些失業者可以隨時取代原工人，使工資不致提高。¹¹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是預防性抑制或現實性抑制（positive checks）的人口控制，都無法解決上述問題：問題不在哪一種方法有效，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會製造出一定數量的過剩人口。

早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沿著馬克思的思路，也對馬爾薩斯出批評。李大釗認為馬爾薩斯對於人口增長過快的擔憂，如果從英、法、美等國的人口統計來看，其實是不對的，這些國家「不惟無人口過庶之憂，且有過減之慮」。其次，他相信人類的能力是無限的，自然界的物力也是無限的，發展生產就能使人類「裕如而得養」，「土地報酬遞減之律，亦非絕對不可抗者」，他相信「文明之程度益進」，即科學技術發展的迅速，「其為不可抗之勢力，何嘗不與土地報酬遞減之律相等」。而馬爾薩斯「純以限制出生預防人口之過庶」，他懷疑此舉是否真能解決人口問題。此外，馬爾薩斯認定人口過多，「則戰爭等等之災殃罪惡，將為必然之結果」，他認為這種看法是「忘卻人類反抗自然之本能」，「隱中人類卑弱之心理，潛滋其貪惰之根性」，而為野心家提供「文飾侵略之材料」。儘管滿是批評，李大釗「並不抹殺其說於經濟學上之價值」，他認為可以「懸其說以為警戒，使人益知奮進，以謀文明之發展」。¹²

李大釗的批評係針對馬爾薩斯的立論和邏輯，陳獨秀則還加上了考慮馬爾薩斯所處時代的情形與其理論的關係。陳獨秀認為，馬爾薩斯關於人口與糧食關係的論點過於武斷，而且「生物的生殖力和蕃（繁）殖力，本來不是一件事」，他批評馬爾薩斯關於「人口按幾何級數率增長」的說法是把這兩者混為一談，是違反科學的。因為他認為，「人類的人口遞增固然是事實，食物隨著遞增也不是空想」。所以，人口出現過剩的現象，並不是什麼普遍規律，而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在馬氏著書當時，機器初興，失業的人多，一時現出人口過剩的假像；馬氏不在這多人失業上研究救濟方法，卻想用限制人口來根本解決，已經同用石條壓平駝背的法子同樣可笑。¹³

陳獨秀還提出了類似**資本論**中的觀點。他認為，社會上一部分人貧困的原因，能否歸結到人口增長率超過了物質生產的增長率，在不同社會裏的情況是不同的，需要具體分析。在生產資料私有的階級社會裏，

¹¹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頁 691-702。

¹² 李大釗，**李大釗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頁 84-85。

¹³ 陳獨秀，「馬爾塞（薩）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新青年**（北京），第 7 卷第 4 號，1920 年 3 月，頁 8。

個人比較的貧困底現象，不一定是因為人口超過了生產資料，大部分是因為財產私有，分配不均，一階級人底佔據有餘，造成一階級人的不足。……只是到了均產社會時代，若是覺得生產資料不足，那時才可以拿人口過剩算貧的一種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為還有科學不發達，生產技術不精，勞動的數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資料不足的一種原因。¹⁴

陳獨秀的論點裏，已經含括了日後毛澤東在「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所表述的重要思想：革命不是因為人口過多，而是上層階級的剝削，只要發展生產，便可以解決人口問題。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不論是孫中山或者是中共創黨者，對於馬爾薩斯在人口研究領域的首創地位，並不是太在意，而更在意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對於社會下層民眾的造反行為所提供的解釋。也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得從事革命運動的人士通常對於這一類的看法持否定態度，唯恐革命的主張和行動被視為「造反無理」。細查毛澤東「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破產」一文所顯現的觀點可知，他對於人口控制是贊成的，但是他又反對把中國歷朝的戰亂、民變乃至於中共政權產生的原因歸結為人口過剩所致。

儘管在改革派和革命派人士的眼中，馬爾薩斯理論有著如許多的問題，並提出了諸多批評，但是現實是，中國的現代化大學教育中，馬爾薩斯理論仍是社會學研究中關於人口問題的研究典範。尤其是在中日戰爭前的 1930 年代，許多社會學者如費孝通、陳達、李景漢等，分別作了許多實地的調查研究。¹⁵這些研究成果不但是了解當時社會和人口問題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是中國社會學領域的教學研究材料。

近代中國思想界批評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至今已有一波高潮。第一波即是上述民國初年，包括孫中山、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孫中山的理由在於唯恐中國人口發展不起來，將有亡國滅種的危險，而李、陳二人的理由則是科學的發展將造成糧食增長。第二波是中共建政初期，伴隨著反右運動，中國大陸若干學者企圖建立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以與馬爾薩斯理論相區隔。中共建政初年的高等院校學科整併以及反右運動以後，社會學不再能開設系所，人口研究自然不能成立，只有政策機關進行政策式研究。也就是說，一直要到此時，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研究，才從馬爾薩斯的研究典範，轉移到馬克思主義。到了 1979 年，隨著馬寅初被平反，一般社會科學的人口研究才重新回到中國學術界，馬爾薩斯理論才又被重新提起。但是贊成和反對馬爾薩斯（有時還夾雜著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正反評價）的兩方仍不斷進行筆戰。第三波則是 1990 年代開始，中國歷史新材料陸續發現，西方各種社會科學方法的引入，中國學界又興起一股以「中國的特殊性」為基礎，反對馬爾薩斯理論的浪潮，李中清、王丰等皆為其中代表人物。

¹⁴ 陳獨秀，「馬爾塞（薩）斯人口論與中國人口問題」，頁 9。

¹⁵ 如陳達的「中國勞工報告」、「人口問題」，李景漢的「定縣社會調查」等。

到了這個階段，馬寅初到底是不是馬爾薩斯主義者已無關緊要了。本文的研究主題，正是第二波反對馬爾薩斯理論的高潮時代，企圖以馬克思主義取代馬爾薩斯主義，成為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新學術／政治典範。可是，在這兩派理論的交鋒過程中，其中有一些問題在當時隱而未顯，如今必須重新檢視。

首先，從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一般性來看，人口與階級，是不同抽象層次的概念，前者是捨象了所有具體的社會特徵，把具體的個人在社會中的複雜關係（家庭、階級、性別等），化為簡單的、去脈絡的個體，而後者則是將個人置入社會經濟的一定結構來考察，即未把階級捨象，但仍是一定程度的抽象，即仍把性別、種族、宗教信仰等差異暫時捨象。即使就以馬克思本身的理解來看，這樣的說法也是完全成立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一文當中，便提出這樣的問題：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考察某一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劃分，人口在城鄉、海洋、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佈，輸出和輸入，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等開始。從實在和具體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佣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麼，這就是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像，並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像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裏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於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像，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¹⁶

在馬克思看來，傳統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問題時，由於不能清楚了解到研究者在思維中所進行分析的工具，即概念，是如何而生（即根據客觀外在事物抽象而生）、其內在意涵（即捨象了什麼）為何的話，那麼這些抽象概念將變得空洞而無內容，研究者也就往往無法正確掌握此一概念的內容及其限制。換句話說，同一事物，基於研究和理解上的需要，可以有不同層次的抽象，其所對應的解釋層次也就不同。¹⁷

¹⁶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17-18。

¹⁷ 馬克思在分析政治經濟學的相關問題時，特別注重各種概念之間的捨象和具象。以政治經濟學的相關概念為例，「身心耗費」、「勞動」和「雇佣勞動」，係依其抽象層次不同而排列，其中身心耗費是最抽象的，包含了勞動和非勞動（如跳舞、爬樓梯）都具有此一特點，但勞動則特定（或者說，增加了此一規定，即具象）指生產性的、經濟性的身心耗費（包括租佃勞動、奴隸勞動、雇佣勞動），非勞動就不能涵蓋其中，而雇佣勞動則又限定了更小的範圍，只指稱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受僱於人的勞動，那麼不但租佃勞動、奴隸勞動不在此中，連資本家自身的勞動都不算在內。

另一方面，越是抽象的概念，其所能涵蓋說明的範圍越廣，但是其內涵卻是最容易含混不清、從而極易造成研究者的過度解釋，這正是馬克思所批評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僱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這兩個問題都是屬於問題設定（problematics）的部分。

其次，儘管批判馬寅初的聲浪甚高，但是包括馬寅初自己，都一再強調自己的理論和馬爾薩斯毫不相干。如果暫不考慮當時的政治氛圍，那麼，到底雙方的是非曲直又該如何看待？關於這一點，有必要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從馬寅初的學思歷程及其傳承，了解他在西方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如何接受到馬爾薩斯和馬克思的理論，即本章第二節；二是考察馬寅初回到中國的各項舉措，這兩大思潮對其作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即本章節三節；三是從 1950 年代當時各家的論辯內容中進行分析，即本章第四節。

第二節 馬寅初思想歷程與傳承

馬寅初的論文指導教授，係哥倫比亞大學的賽利格曼（Edwin R. A Seligman），賽氏著有在國際經濟學界權威性的**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專長於歷史主義經濟分析及財稅問題。此一研究途徑，當時橫掃德國、法國、俄國、英國，蔚為風潮，時稱「歷史主義學派」（Historicism），主要代表人物為英國的阿什萊（Williams J. Ashley）、德國的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等人。在這一學派當中，日耳曼裔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 G. List）可謂開宗立派之人，影響力遠播當時的美、俄等國學界。

李斯特終其一生為求日耳曼地區的政治統一，他曾因為政治上主張日耳曼統一和政治民主，遭到政治迫害遠走美國，也曾為此放棄優渥生活和公職。1846 年，他在窮病交迫的情況下自殺身亡。**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是他的最重要著作，南北戰爭後美國工業產品面臨正式在海外與歐洲國家的競爭，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理論正可成為美國的護身符，而使得李斯特的作品成為美國大學中重要的教科書，歷史主義學派在美國大行其道。¹⁸

¹⁸ 1848 年革命以後，大量的日耳曼政治難民移入美國，成為了除了英國移民之外的最大宗。而這些日耳曼移民在美國中上層社會日漸嶄露頭腳，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的政治態度和一部分的社經利益，使得他們在稍後的美國南北戰爭中幾乎毫無例外地加入了北方反對奴隸制的陣營，因而在南北戰爭後的影響力增大。關於日耳曼裔移民與美國的相關背景，詳見 Carl Wittke, *Refugees of Revolution: The German Forty-Eighters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2)；關於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的經濟結構與外貿政策變化，詳見 Sidney Ratner, *The Tariff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72).

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在近代經濟學的發展上，不但代表了 19 世紀中期以來反對自由貿易的理論和主張，也闡建了一種新的經濟學理的分類方式。在列舉了英國對外推行的自由貿易係以國家財經政策作為後盾之後，他認為當時日耳曼地區尚未統一，國家無法成為這樣的利器，因而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將造成嚴重的損傷：

現代的日耳曼地區，既缺乏一個有力的、統一的商業政策，在國內市場又有一個處處勝過它的工業強國〔指英國〕跟它進行競爭，它在這個競爭力量之前毫無掩護，一方面在國外市場剛受到霸道的、往往變幻莫測的限制政策的排斥，就它文化發展的程度來說，在工業上已有的進展與應當達到的進展，實際上相差得極遠，因此種種，它甚至不能保持它原來已經取得的地位，它就像一個殖民地一樣，竟被一個國家所任意利用。¹⁹

他認為，英法等國之所以能夠建立現代政治經濟系統，並非以國家自治、政治自由為基礎，而是以恰當的公共制度和法律為基礎、以國家行政和外交為基礎，更重要的是，以國家的統一和權力為基礎。²⁰因此，李斯特認為，德國必須在自然資源充分開發、政治力量與他國大體均等的情況下，進行自由貿易，才不至於使得國家利益受損。²¹李斯特提出後進國家應該通過國家干預，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來加快經濟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便是稅收與貨幣政策。這些經濟思想，實與十八世紀以來自由主義經濟學不同：自由市場不再是始終不變的原則，而是經濟發展的手段之一，實施與否，端視各國發展情況。因此他批評亞當斯密的看法：

亞當斯密……在他書裏的個別場合談到各種政治經濟制度時，只是為了指出這些制度的無成效，從而證明必須以「世界主義或世界範圍的經濟學」來代替「政治的」或「國家的」經濟學。……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勢下，實行普通自由貿易的結果是不會產生一個世界範圍的共和國的，情形將適得其反，比較落後的國家將普遍屈服於工商業與海軍強國的優勢之下，作出這種結論的理由是極其充分的，在我們看來，這樣的形勢簡直是萬難避免的。²²

由於李斯特認為亞當斯密以降的政治經濟學已把經濟學的原則一般化，早已把政治的部分（即國家的經濟角色）拋諸腦後，他並不贊成，因而將他們統歸為「世界主義經濟學」，而把自己的理論稱為國民經濟學。²³

¹⁹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arland, 1974), p. 38.

²⁰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1.

²¹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 42.

²²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 62.

²³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 66.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李斯特又把亞當斯密以降的政治經濟學稱為「價值派」，因為亞當斯密的分析係以財富為出發點，而所謂的

李斯特有別於斯密的看法，強調要從生產力作為出發點，而非經濟價值，不僅僅是純粹方法論上的論辯，因為它最終將造成如何國富民強的決策走向：

這個學派〔指價值派〕只是由於對生產力的性質沒有作適當研究，對國家情況不作綜合考慮，因此對於農工商業、政治力量和國內財富作等比例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國家特有各工業部門取得充分發展時這種工業力量的價值等方面，就格外地不重視。……它沒有看到，僅僅從事於農業的國家與工農並舉的國家兩者之間的差別，比從事於畜牧的國家與農業國家之間的差別還要大得多。²⁴

從上述的論點可知，李斯特一方面將 18 世紀以來政治經濟各個學派的流變，分為「價值派」和「生產派」，同時批評「價值派」的觀點並不能照顧到社會上其它非工業的生產階級（其中農業最為明顯），如此一來，不但整個「價值派」的學說體系立論有誤，而且也不適用於像德國這樣一個政治尚未統一、國家財政手段未能發揮的地方。因此，他以自身的「生產派」理論體系出發，不但企圖說明生產力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同時在落後國家發展初期，必須以自由貿易的方式大量進口機器、原料等生產設備，待得本國工業建立，國家就必須以保護主義的政策進行，扶植本國工商業；直到本國工商業生產力大為發達，生產有所剩餘，必須再將政策調整回自由貿易政策，協助本國工商向外拓展市場。此一三階段發展論，的確也成為了 19 世紀德、美等資本主義後進國家的政策方針。

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如何評價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這是理解馬寅初人口理論的重要問題。李斯特從兩方面反對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首先是關於自然資源的開發問題：

人口增長率大於糧食生產增長率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世界上還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沒有開發，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應；情況既然是這樣，這種糧食與人口兩者不能相平的想法，或者用假想的計算、詭譎的論據來證明這種臆說的辦法，可以說至少是愚昧的。以生產力的目前限度為標準，據以計算多少土地能夠養活多少人口，這樣的想法只是由於器量不大，目光短淺。²⁵

財富即是交換價值。然而生產力在他看來更為重要，因為「一個人可以據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他以德國和西班牙為例，德國過去每一個世紀總要受到疾病、饑荒或內亂、外戰的摧殘，但是它總能保持住大部分的生產力，因此每次受到打擊以後，總是能很快地恢復到一定程度的繁榮。西班牙原來是既富且強，不過是備受專制和僧侶勢力的折磨的，雖然它的國內環境比較地和平，但是總不能擺脫貧困，而且越陷越深。

²⁴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 68.

²⁵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 72.

在他看來，馬爾薩斯的理論是把生產力限定在當時的基礎之下，而生產力會由於自然資源更大更多的開發而前進、擴大的，因而馬爾薩斯的目光過於短淺。此外，馬爾薩斯由自身理論出發，反對濟貧措施，也遭到李斯特的強力批評：

我們說馬爾薩斯的學說看來是胸襟狹窄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會發生一種違反自然的作用，從而毀滅道德和力量，這個方法簡直是可怕的。這個學說企圖毀滅人類的一種願望，這種願望是造化用來激勵人們發揮身心力量、激起並支持人們高尚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類所以有進步，主要就是由於這種願望的存在。這個學說將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為一種法則，它對我們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著一個人在挨餓，也應該不聞不問，因為假使給了他飲食，三十年後也許另有一個人要因此處於饑餓狀態。²⁶

對於貧民的處境及其改善之道，李斯特顯然遠比馬爾薩斯更為在意，這些在意已從理論本身，轉向了道德層次，而這樣的道德轉向，往往是西方學界對馬爾薩斯的主要批評面向之一。這也是馬爾薩斯理論在西方為何飽受批評的另一層原因。

至於師承歷史主義學派的賽利格曼，終身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民國初年中國的經濟學者如陳煥章、馬寅初、趙迺搏等，都是出自他的門下。賽利格曼在歷史主義的薰陶下，研究史料和思想源流的分析著墨頗深，對各種思想流派並無偏見，甚至曾引介社會主義思想。他的著作大多偏向財稅政策的討論，其中最能表現他對歷史主義學派的傳承者，當屬**歷史的經濟解釋**(*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書。他指出，人類此一群體，必須仰賴自身的能力方得存活，因此，經濟生活是人類各生活當中最基本的。人們處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之下，就會依著那樣的條件進生產和消費。若是以這個觀點來看，賽利格曼的觀點與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觀點若合符節。但是他特別表明，儘管他的觀點近似於馬克思，但是他非常反對「歷史唯物主義」一詞的用法，因為此一詞語在當時的解釋中，空洞且不精確。在他的觀點中，個人的特質和經濟的情況一樣重要，都是解釋歷史和社會變遷的兩大動因，故賽利格曼把自己的理論傾向稱之為「用經濟解釋歷史」。²⁷

賽利格曼對馬克思的思想非常熟悉，甚至於在美國學界大多數人還不清楚馬克思許多著名的早期著作（如「哲學的貧困」、「工資、價格與利潤」等）時，推介了這些作品，並將這些馬克思的早期著作置於「經濟解釋歷史」的思想脈絡當

²⁶ Friedrich G. List,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pp. 72-73,

²⁷ Edwin Seligman,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Batoche Books, 1999), p. 4. 本書的相關文章皆於1901-1902年間寫就，發表於**政治科學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中。可是他強調，贊同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並不同贊成馬克思主義式的革命手段：

馬克思研究經濟情況，促使他成為了「科學社會主義者」，但是這不是我們所要關心的，那只是一種經濟學教義，基於這個教義所發展出的關於剩餘價值和利潤的問題，的確值得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的注意。但是我們必須聚焦在他的哲學上面，而非他的經濟研究，因為正是他的哲學，而非經濟研究，導致了他對歷史的經濟解釋，從而促使他投入全力更加深入地研究經濟問題。²⁸

話雖如此，一位對馬克思的學說如此推崇的經濟學家，或者說是經濟史學家，而他本人卻半點不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似乎是說不過去的。的確，不然我們就很難想像，為什麼賽利格曼會與另一些左翼的激進學者共同創辦美國東北部素以激進自由主義和左翼思想大本營著稱的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了。²⁹

賽利格曼本人的政治社會實踐倒不是本文的重心，問題是這些經歷會讓他對於像馬寅初這樣的中國留學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又有多少會轉化成爲學思傳承當中的重要內容。以目前可知的材料來看，賽利格曼最重要的研究主題在國家財稅方面，而這樣的學思背景和研究重心，的確也反映在馬寅初的學思觀點上。

美國的財政制度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正，原因便在於像賽利格曼一類學者的呼籲。由於當時美國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公共財政未見隨之改善，社會上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因而要求累進稅制的呼聲在學界越來

²⁸ Edwin Seligman,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 11.

²⁹ Warren Lerner, *A History of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n Modern Time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4), pp. 208-209.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考慮到，1920-1930 年代歐美各國的政治社會情形，似乎也可以有另一番體會。1920 年代，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歐陸的主要國家，紛紛出現了共產黨，更遑論原有的社會民主政黨。自由主義因一次大戰受挫，整個歐洲社會在左右兩個政治力量的擠壓之下，形成了非左即右的時代。在美國，尤其是在經濟大恐慌之後，非左即右的政治氣氛也是不遑多讓。儘管賽利格曼所處的年代，比起凱因斯要早上十幾二十年，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尚未開打，但是，1920-30 年代非左即右的社會氣氛不是一蹴而至的，換句話說，左翼激進思想在一次大戰之前的美國，便佔有了不可忽視的一席之地。我們只要看到兩件事，便可以了解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左翼思想和左翼的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一是 1885 年芝加哥工人集會要求爭取八小時工作日，而後演變成全世界的「五一」勞動節，以及早在 1890 年代美國各種社會主義和勞工政黨的出現。19 世紀末時美國便已有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和社會主義勞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成立，規模較小，美國社會黨（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簡稱 SPA）則於 1901 年成立，並將上述兩個政黨併入。相較於「理性之都」所在地的法國，以及馬克思、恩格斯的祖國德國，兩國的左翼政黨的發源時間，並不比美國早太多。因此，縱然相較於歐陸，美國左翼力量顯得較為分散，但是絕對不是一支可忽視的力量。只因俄國革命的出現，世人對於左翼思想的力量才聚焦到舊大陸上，因而忽略了新大陸的左翼傳統。

越強。賽利格曼便是其中的主要倡導者。³⁰比他們早一個世代的美國經濟學家，通常稱之為「進步時期的經濟學家」（Progressive Era Economists），他們認為，稅收的本質，只是工商業者在獲得國家、政府的公共服務（如交通運輸、行政配合）時所必須支付的費用，因而，在這樣的理解之下，稅收純粹是經濟領域的事。可是賽氏等人不作此想，他們認為稅收的意義遠大於此，稅收的用途還要用於滿足政治和社會的目的：

一個文明的社會中，國家就像是人們日常的呼吸一樣的必須，即便是反政府人士和無政府主義者也不能離此而生。個人的所做所為都不能否認它的存在，他無法選擇國籍，因為國家是生而致之的，國家和個人生活交織在一起。若說支持國家只因它能讓個人受益，未免過於眼界窄小而自私。我們繳稅給國家並非我們能從國家受益，而是支持國家就是支持我們自己的生活 and 家庭福祉，這也是我們的責任，國家就在我們之間。³¹

國家既是如此被看待，其所收用的費用便不可以等閒視之，如何用財政稅收達到經濟領域以外之目的，便成為這一波美國財稅制度改革的重點。賽氏認為，國家稅收的原則必須超越現有的系統，同時要以個人收入為最高的課稅原則因而將更向正義趨近，「其它名目的課稅也應以此為準，才能盡可能接近正義」。³²

從上述賽氏的財稅思想和經濟史思想可知，賽氏一方面深受到以李斯特為主的經濟思想原則，強調經濟對於人類歷史發展以及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同時也繼承了以財稅制度作為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尤其是後者，明顯影響了馬寅初，成為馬寅初回到中國以後最為在意的事。

至於馬爾薩斯，賽利格曼似乎並未有明顯的好惡之感。在他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書中，賽利格曼仍以經濟解釋歷史的角度強調「溫帶奮鬥說」，並對於各家各派的經濟思想作了概要的介紹。³³講到馬爾薩斯，賽氏在簡介了馬爾薩斯的主要論點之後，只提到此一理論可以往三個方向發展，一是社會主義，一是經濟學的工資論，一是應用於經濟進步論。³⁴

³⁰ 關於此一時期美國財政和稅制改變，詳見 Ajay K. Mehrotra, “Envisioning the Modern American Fiscal State: Progressive-Era Economists and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U.S. Income Tax”, *UCLA Law Review*(Los Angeles), No. 52, pp. 1793-1866.

³¹ Edwin Seligman, *Essays in Tax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5), P. 70. 本書初版於 1895 年，此一版本已是第五版。

³² Edwin Seligman, *The Income Tax: A Study of the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come Tax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New York: Macmillan, 1911), P. 18.

³³ 所謂的「溫帶奮鬥說」，即對於文明的起源提出說明，要點是：由於寒帶過冷，人類即便努力求生亦有困難；熱帶環境優渥，即便人類不付出勞力，天然物資垂手可得；只有溫帶地區，自然條件不太好也不太壞，人類必須稍加努力，才能克服自然障礙，因而造就溫帶人類發展成文明社會，寒帶和熱帶的人類則沒有。

³⁴ Edwin Selig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5), pp. 58-59.

第三節 馬寅初早年的財政思想與經濟理論

1914年，馬寅初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紐約市的財政」，獲得賽利格曼的稱道，更一度被哥倫比亞大學作為教材使用。這可被視為其財政思想的發源之一。在序言中，馬寅初說明了他的研究動機，指出紐約市財政制度與中國財政制度相比，相去不遠，因為二者在編制預算的方法上，都只包括撥款總額，而沒有支出用途和目的的任何明細分類規定，並且二者外債皆大幅增長。但是紐約市財政卻可維持，但是中國財政明顯每下愈況。希望能透過此一研究，「能為中國上一堂有益的課」。³⁵他認為，紐約市以往的財政問題，在於「浪費、偏袒和腐敗」，近年進行財稅制度的改革，由於從對來年預算的估計分析、課稅收入、科目用途、籌資（如債券發行），到撥款的支出，巨細靡遺全盤掌控，尤其是費用的控制，「使得政府部門的開銷幾乎不可能超出在每個帳項中所允許的」。³⁶這些經驗正可作為中國財政制度的借鏡。

歸國後，馬寅初先於北洋政府財政部當中任職，深深了解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他在1920年代所撰寫的「中國關稅問題」、「財政學與中國財政——理論與現實」等著作和發表的若干相關論文，都可顯示出他希望把中國財政制度建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收支平衡的系統。在1930年代以前，關於經濟學和財經政策的文章，則特別重視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對中國的影響，尤其在中國國家貨幣的信用建立、國家稅收的獨立，以及國債之處理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顯示出馬寅初與李斯特和賽利格曼一脈相承。

馬寅初指出，建立國家貨幣信用，是所有現代國家經濟的首要任務。建立了國家貨幣的信用之後，不論對內的各種商業支付，或是進出口的關稅徵收，乃至於國內稅收的計算標準，都能按新的國家貨幣進行核算和支付，全國貨幣方能統一，國家貨幣的信用也才能更確立。因此，建立國幣信用和財稅支付方式，二者之間關係密切，相輔相成。³⁷

關於民國初年中國貨幣的混亂情況，馬寅初認為，首先肇因於清末鑄造現代貨幣時（即龍銀或龍洋），各省所出的質量不均，造成全國物價不一。其次在於供求不相應，北洋政府每年只定量產製銀元，而非視市場供需調節，通貨不足或膨脹因之而起。解決的方法在於落實民國三年所制定之「國幣條例」，將鑄幣權交由國民自由鑄造，而非政府壟斷，並嚴格按照「國幣條例」第二條「以純銀庫

³⁵ 馬寅初，「紐約市財政」，收錄於**馬寅初全集**第一卷，頁1。

³⁶ 馬寅初，「紐約市財政」，**馬寅初全集**第一卷，頁2；7。

³⁷ 馬寅初，「吾國關稅與貨幣之關係」，**馬寅初全集**第一卷，頁547-554。

平六錢四分八厘為標準，定名為『圓』、第五條「一圓銀幣總重七錢二分，銀九成，銅一成」之規格鑄造。如此一來，每個銀圓中內含的銀重量正是六錢四分八厘。若能做到上述兩項，並從外貿部分開始實施，轉而影響國內物價和幣值，則可大幅改善國幣的混亂情形。³⁸

至於財政自主的問題，則頗為複雜。在馬寅初看來，無論從當時的國際局勢來看，或者從中國自身情形來看，關稅問題是中國各種財政問題的重中之重：

歐戰以後，世界最大問題，厥為經濟問題。証之往事，洵不誣也。俄國之過激派運動，有疑為政治問題者，實一經濟問題也。故近代經濟學家，如賽利格曼者，大倡歷史經濟觀之說，謂經濟問題為社會問題之根本問題，餘皆枝葉而已。吾國自光復以來，其最重要之問題，不過一經濟問題而已；而經濟問題中之最重要者，厥為財政問題；財政問題中之最重要者，其惟關稅問題乎？默觀以往之財政事實，靜察近來之財政狀況，何一非直接間接以關稅收入為樞紐者。³⁹

由於北洋政府時期，關稅政策不能自主，規則之修改或稅率之變動，必須與各國協商，加上庚子賠款用關稅抵免，因而關稅無法自主。⁴⁰馬寅初認為，除非收回關稅自主權，否則國家財政必將難以整頓，中國的國際地位亦難以扭轉，「人必先自重而後人重之，立國於世，亦當如是」。⁴¹

國家收入被外人所盤剝，各種花費卻又不得不支應，國債日重。馬寅初根據北洋政府公布之統計數字，以及劉大鈞（時在北洋政府財政部任職）的研究，發現中國政府當時國內外債共計 17 億 83,178,028 圓。一般而言，國外債多半用於實業，少數具有外國之政治目的，欲以此控制中國內政，如日本當時的提供的「西原借款」。國內債許多則有勾串之嫌，不是真正為了國用，而是債權人利用此一方式坐收利息之圖。時論一般傾向優先處理外債，因為「內債不還，不過對人民損失國家之信用，外債不還，必致牽動國際交涉」。馬寅初基本上不反對這樣的說法，但是他要求必須對外債詳加核實，尤其是許多外債利息奇高無比，少則三分（30%），多則八、九分。因此，馬寅初認為，國債問題必須按三個步驟處理：一是化散為整，把對各國之公私債務統一由同一個經手人辦理，中國不必也不該各自向外國債主一一交涉；二是減重利為輕利；三是延長還款年限。可是當時的中國，「軍閥專橫，窮兵黷武，雖竭全國之財源，難填無底之餉窟與私人之欲壑。

³⁸ 馬寅初，「吾國幣制之整理」，**馬寅初全集**第一卷，頁 405-414。

³⁹ 馬寅初，「中國關稅問題」，**馬寅初全集**第二卷，頁 137。這所說的「光復」，係指辛亥革命，時稱光復。

⁴⁰ 馬寅初，「中國關稅問題」，**馬寅初全集**第二卷，頁 141。

⁴¹ 馬寅初，「中國經濟之分裂」，**馬寅初全集**第二卷，頁 505。

以致國貧民病，債台高築」。⁴²從這裏不但可以看到馬寅初對中國經濟問題的了解，同時也可以理解馬寅初的政治態度，因而就可以理解廣州國民革命政府於1928年統一全國之後，馬寅初對於國民政府的支持態度。

當時中國的經濟學家，像馬寅初一樣亟思建立中國自主財稅體系的人不在少數，但馬寅初是最早、年紀最長、學經歷最豐富、影響力最大的一位。與他同期的陳煥章，或者是稍早於他的賈士毅，雖然在這些問題上的見解大同小異，但是陳煥章只在學院之中，賈士毅則是專業官僚，各限一方，只有馬寅初介於二者之間，上他課的學生，聽他演講的聽眾，不只是一般學生，還有許多財政部中低階層的官員，以及各地方的財經官員。尤其在1929年之後，馬寅初就任統一後的南京中央政府立法院之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委員及委員長，並出任中國經濟學社的社長，對國民政府當局和當時中國的經濟學界，影響力更是直接而廣大，不但國民政府高層曾安排馬寅初為中央政府官員講演授課，馬寅初所編寫的講義、教材也廣為各大專院校所用。

不過，儘管其師賽利格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頗多借鏡甚而讚賞，馬寅初在回國初年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卻是頗不欣賞。馬寅初反駁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理論的文章和演講頗多，都是集中在1920年代，當時的馬寅初正在北京大學任教，這些文章大多應為馬寅初在北京大學上課的材料。綜合各篇文章要旨，其主要論點如下：

- 1、中國的社會主義者高唱勞動神聖，資本萬惡，可是中國現在的工廠工人，生活和收入遠比其它自營作業者（如人力車伕）來得好；
- 2、這些社會主義者除了陳獨秀之外，沒有人真的進行過調查研究，不知中國經濟實況，空喊口號；
- 3、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與亞當斯密（Adam Smith）、李嘉圖（David Ricardo）等人一脈相承，從財富的產出面出發，認定價值由勞動生產。這樣的看法有其漏洞：資本的作用被忽略、使用價值大者往往交換價值小因而有矛盾、不同性質和難度的勞動如何衡量等，必須由近年歐美流行的效用論、邊際效用論和社會價值論來說明方能成立；
- 4、蘇聯近年欲實施按勞分配，取消貨幣，終歸失敗；
- 5、歐美各國由於資本力量龐大，分配又不均，故資本萬惡說有其道理，而中國現在不是資本太大太多，而是資本太小，真正的弊害不在勞資問題，而是軍閥禍國；
- 6、馬克思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不適用現在的中國，李斯特的保護主義和關稅統一學說較適用於現在的中國。⁴³

⁴² 馬寅初，「無確實抵押品之內外債問題」，**馬寅初全集**第二卷，頁281-294。

⁴³ 這些評論文章和演講，包括「評今日我國之講社會主義者」（1922年3月）、「馬克思學說與李

其中第三點和第六點，明顯表現出其學思流派的影響，而其它各點的看法，則體現馬寅初對當時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空泛之批評，以及他對當時中國財政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看法與馬克思主義者的差別：馬寅初認為中國現在不患不均，而患貧，而貧之所以由，則在工商不發達、財政不自主。因此，儘管當時馬克思主義因五四運動和俄國革命而於中國青年知識界大行其道，但是由於馬寅初認定馬克思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還沒發生，或者才剛開始，問題不大。但這些問題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本身的問題，在馬寅初看來，馬克思的理論真正的問題在於第三點，即許多新近的經濟學研究和批評顯示出馬克思主義之不足。其中關於效用論、邊際效用論與馬克思主義學派之間的理論爭議，正是發生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並以歐陸為主，馬寅初在學之際，想必聽聞過此一論爭，因為他所提出對馬克思理論的批評部分，正是當時論戰的焦點問題。⁴⁴

至於馬寅初如何看待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馬寅初早年對於人口問題並沒有太大的關注。他學成歸國的時間在 1915 年，到北京大學任教時是 1916 年，自 1916—1930 年間，馬寅初的文稿、演講等，大多集中在當時中國的國家財稅制度及工商發展等問題，僅在 1920 年 7 月時於**新青年**發表一篇「計算人口的數學」一文，談到了如何計算一國的人口。這篇文章的立論基礎明顯來自於馬爾薩斯，因為馬寅初認為：

人口的增加，是好比數學上的複利息。複利息是要利上加利的（interest produced interest），人口增加也應該如同複利息一樣，不應該像那單利息一成不變的。……上面所說的計算方法，從表面上看起來是絲毫不錯的；但是從實際上去說，卻是有點錯誤，因為每年人口的增加是不能一律的，隨時有變更的，故計算的數目是不能盡信的。若是要信任計算的數字，不能不用他種方法去校正（check）。⁴⁵

此一計算方法，即是根據馬爾薩斯「人口係以幾何級數成長」為基礎的。不過，人口問題對當時的馬寅初而言，就算心中有所定見，卻是極少表示意見的，他當時的主要心力，還是放在中國財政自主的問題上。

士特學說二者孰宜於中國」（1922 年 5 月）、「中國歷代經濟政策，尚共產乎，抑尚均富乎？」（1927 年 3 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之勞農」（1927 年 4 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實行之可能性否？」（1927 年 5 月）、「馬克思價值論之批評」（1927 年 10 月）、「資本主義歟共產主義歟」，**東方雜誌**（北京），第 28 卷 24 號，1931 年 12 月 25 日。除了最後一篇文章之外，其餘皆分別收錄於 1923 年至 1928 年間陸續出版的**馬寅初演講集 1—4**（上海：商務印書館）。

⁴⁴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關於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爭論，詳見 Michael Charles Howard and John Edward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1883-1929*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⁴⁵ 馬寅初，「計算人口的數學」，**馬寅初全集**第一卷，頁 304-306。

嚴格來說，馬寅初早年並沒有自己的經濟理論，而對於經濟理論的討論，多半停留在轉介西方各國主要經濟理論流派，並在自己的著作中予以評點。真正屬於他的經濟理論，要到 1950 年代以後才算出現，即「綜合平衡論」。在此之前，馬寅初更多的時間是投入在處理各個時期的中國實際財經問題，而非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

綜上所述，馬寅初對歷史主義經濟學派的學思重心，儘管未有明確的表示，但從上述的分析當中，仍能夠看到內在的連繫理路。首先，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理論從單一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出發，強調國家必須利用各種財稅政策作為工具，扶持民族工業資本的興起，並特別要注意農業的生產。至於財稅政策的工具性和實際效用，則在賽利格曼的學說和作為當中表現突出，這些思想遺產都在馬寅初回國之後的各種演說和文章當中得到體現。不過，由於中國當時財稅並未自主，國家貨幣的信用尚未建立，因而歐美常見的財稅手段未能馬上實現，必須先將財稅自主權和國家貨幣信用建立之後方能付諸實行，而國民革命的成功正是實行上述經濟改革的條件。這些看法正是馬寅初回國初期各種演說和文章所欲表達的重點。

第四節 馬寅初對馬克思主義與馬爾薩斯主義的態度

抗日戰爭期間，馬寅初在政治上的態度產生變化，對國民政府從支持轉向反對，日益同情並支持中國共產黨。這一部分，本文將在第四章詳加說明。但是，在經濟理論上，馬寅初卻要到 1950 年代之後，才真正系統性地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著作。但是由於 1957、1958 年的「新人口論」和**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等著作的發表，以及其所引發的批評，在馬寅初與其批評者之間的往來過程當中，可以從中看出雙方對馬爾薩斯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如果詳加考察各種各樣批評馬寅初的文章，將會發現，其實絕大多數的文章所抱持的理由幾乎都是大同小異，其中最具原創性、最全面地批判，要算是張培剛、毛鋼、胡峻傑合著的文章「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與中國人口問題」。以三人的年齡、學經歷而論，毛鋼、胡峻傑只是張培剛的學生輩，因此真正的論點應是出自張培剛之手。⁴⁶此篇文章雖然並未點名馬寅初，但馬寅初被其他批評者認定是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主要論點，卻往往脫不開張培剛等人的基本論述。因此，本節將以馬寅初上述的兩個著作進行分析，主要放在「新人口論」，同時輔以張培剛的觀點與之對照，以期了解論戰雙方的論述重心，以及他們在論戰過程中所體現的雙方對馬爾薩斯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不過在了解馬寅初此一時期的思想狀態時，要注意到一件事：自 1980 年代

⁴⁶ 張培剛生於 1913 年，毛、胡二人至今仍在張培剛當初創立的華科技大學擔任博士生導師。

以來重新編輯的馬寅初相關文集、選集和全集，許多馬寅初關於人口問題的文章或講話，雖然全文對於要求控制人口的精神未變，但是若干字句和語氣等已有所修正，已與**人民日報**或其它原刊物的原文不同了。例如在**人民日報**的記錄中，「新人口論」第五段關於積累率的問題上：

我們不能如蘇聯一樣把積累提高到 25%，把消費壓低到 75%，那就等於說我們只顧工業化，不顧人民了，不免會出亂子。波匈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政府只顧工業化，不顧人民需要，使人民對於工業化的熱望一變而為對生活的失望，因此出了亂子。

而在**馬寅初全集**裏，關於波匈事件的評價文字便已消失。其中的差別，有二種可能，一是當時的**人民日報**編輯硬加上去的字句，以為事後反擊準備，後人編輯時則把這些字句刪去；二是**人民日報**係將全文刊登，1979 年馬寅初獲得平反之後為免爭議或為賢者諱，而刪除類似具爭議性字句。以當時中共高層政治圈內對馬寅初的關係，包括他在整風時期的態度而言，前一種情況可能性是偏低的，後一種的可能性則相對較高。⁴⁷儘管這些差別不至於影響全文之內在精神，但了解此一背景對於理解當年的爭論有一定的作用。

「新人口論」一文的內在精神，其實在當時馬寅初發表的許多篇文章中一再出現。1981 年，馬寅初的文章又再一次重見天日，北京出版社將他當年與「新人口論」相關的文章集結成書，包括「新人口論」、「我國人口問題與發展生產力的關係」、「有計劃地生育和文化技術下鄉」、「為什麼強調人口的質量？」、「失業問題」、「關於『新人口論』的說明」、「附帶聲明」以及「重申我的請求」。此外還有三篇附錄，分別是馬寅初在不同場合所發表的「新人口論」的觀點的說明或報章摘錄。⁴⁸儘管各篇章的偏重點稍有不同，但是對於中國人口增長太快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壓力，是其中一貫的精神。

「新人口論」一文無疑地是研究馬寅初思想的重要文件，但就整體性和概括性而言，卻不如他的「團團轉理論」。可以這麼說，「團團轉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馬寅初個人的思想創見或思想體系，並且把馬寅初的經濟理論「綜合平衡論」納入此一體系之中。而「新人口論」一文，則是與當時中共政經情勢的對策性分析，內在精神卻不離「團團轉理論」的思想。不過「團團轉理論」所涉範

⁴⁷ 近人評論也談到類似問題，詳見孫大權，「馬寅初全集補正」，**社會科學研究**（北京），2004 年第 3 期，頁 119-125。尤其是頁 124-125，就批評了**馬寅初全集**中隱晦了馬寅初曾贊許馬爾薩斯的部分言論，這些文字差別極為重要，不論是從理解馬寅初對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解而言，還是對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時，在「以言論罪」的前提下，判別哪些言論可能獲罪而言，一言之差，可能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相反待遇。

⁴⁸ 文末還附有一篇由田雪原所寫的「馬寅初先生和他的『新人口論』」。詳見馬寅初，**新人口論**，頁 86-91。田雪原，1938 年生，現任中國人口學會常務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專家評議組成員等職務。

圍過廣，甚至於牽涉到程朱學派思想的評價問題，離本文題旨甚遠。另一方面，「綜合平衡論」雖說是馬寅初的經濟理論的總概括，但是當時許多中國大陸的經濟學者，尤其是與國務院交往較為密切的人，都有此一觀點，如就獨創性而言，似有不足，故本文的焦點仍將集中在「新人口論」之相關經濟論點上。

「新人口論」的主要論點如下：

1. 現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階級矛盾已經不是主要的矛盾，人口多，資金少卻是一個新的矛盾。過去的矛盾是階級矛盾，現在的矛盾主要的是生產矛盾。
2. 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國人口是6億0,193萬餘人，年增率是20‰，經過馬寅初實地在浙江的訪問調查以及理論推估，這個數字有低估之嫌，實際年增率可能大大超過20‰。
3. 人口增殖的原因：經濟改善，結婚增加；福利照顧，幼托制度；醫療進步，老人死亡率下降；內戰消滅，盜匪絕跡；僧尼還俗，娼妓絕跡；舊思想殘餘，無後為大；獎勵生產，經濟補助。
4. 要改善人民生活，就要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為此就要增加積累，因而要增加國民收入。1956年國民的積累／消費比例是21/79，積累不夠。
5. 馬爾薩斯人口論的錯誤：「級數增長說」不適用於拿破崙戰爭之後的歐洲，因為糧食增長在科學投入之後加快了。而且馬爾薩斯透過人口論的研究企圖論証工人的貧窮是由於自己的增生所造成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這種觀點，貧窮的真正原因，是社會因素，不是自然因素，是地主剝奪了農民辛苦的成果所致（生產關係）。現在中國是社會主義社會，又跟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更與馬爾薩斯的時代不同。現在的缺點不是生產關係不好，而是勞動生產率太低，因此要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6. 「新人口論」不同於馬爾薩斯理論，以中國實際情況而言，要增產糧食，就要先有現代化倉儲。這些設備的資金從何而來？原料（鋼鐵、水泥、木材）又從何而來？由於現代化生產所造成的人力節省（約可省下95%），這些人國家又要花費工資照顧，如果每年又多生1,300萬人（以年增率20‰計），問題就非常嚴重。
7. 中國現在搞許多中小型工業，為的就是多安插人，但社會主義就該要多搞大工業，過多人口拖住了高速工業化的腳步。農業方面，生產率低，要改善生產力，到頭來還是只有機械化。一樣，資金和原料哪裏來？
8. 因此，可否把提高積累比例？蘇聯是25/75，但中國國情不同，無法再大力提高積累。但提高積累是必經之路，因此，要先控制人口生育，才能使消費人口減少，才能增加積累。
9. 人口一多，增長遲滯，科研受阻，糧食緊張。為今之計就是要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要加強避孕，反對人工流產：一則殺生，二則傷害女性健康，

三則沖淡避孕意義，四則增加醫生負擔。

- 1 0 ·四川省內江縣雙井農業生產合作社對此有過一場鳴放大辯論(1958年)後，計劃生育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要和平共處，要做到不去侵犯外國，就必須控制人口。
- 1 1 ·文化和知識要下鄉，要讓知識份子的知識能與生產結合，提高農村生產力。有許多高中畢業生想到要在城市就業，但發現就業困難，卻不知真正需要他們的正是農村。
- 1 2 ·中國人口數量與質量極不相稱。人民公社建立之後，新的生產關係齊備，但生產力趕不上。要趕上只有工業化、機械化，發展大量協作。資本主義會因工業化而造成失業，社會主義不會，但是還是有許多問題有待克服，蘇聯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其中的第四點，可以說是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的最重要動機。作為一名經濟學家，同時又作為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的副主任，馬寅初與其它社會學出身的學者如陳長蘅、陳達、吳景超等，看待人口問題的重心，有所不同。前述三人更多地注意人口過多對人口質量、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馬寅初則把人口過多的問題更加地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效率和效果進行連繫。在他看來，1950年代中期的中國大陸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發展生產。可是要發展生產，尤其是現代化、大工業式的生產，必須增加積累。但是在當時生產力不可能一夕提高、而借用外資又不可能、積累／消費比例又不能有太大變動的情況下，只有從減少人口以減少消費做起：不能從分子擴大入手，只好從分母變小做起。

張培剛等人的「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與中國人口問題」一文，係針對馬爾薩斯主義而批評，而不是馬寅初，並企圖在文章中建立起社會主義的人口理論。比較「社會主義的人口規律與中國人口問題」與「新人口論」這兩篇文章的論証方式和論述內容，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這兩位作者都在其文章當中批判馬爾薩斯主義。這樣的做法，除了建立自身理論的必要性之外，政治表態應該也是其中重要的考量，尤其是對馬寅初，因為是他被人指為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但是，如何反駁馬爾薩斯理論？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這不但是理論問題，也是立場問題。

通常反駁的方式往往採取兩種做法，一是以經驗(歷史)反証馬爾薩斯的「人口按等比級數增長」與「糧食按等差級數增長」(其背後的原理是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肥力遞減」規律)。馬寅初便曾以法國和夏威夷為例作為反証，批評馬爾薩斯的理論。然而就邏輯而言，經驗反証法在方法論上，除非其所反駁的論題是一全稱命題，否則難以成立。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把馬爾薩斯所提出的「人口按幾何級數成長，糧食按算數級數成長」的說法不是看成一種「公式」，只看成是一種「趨勢」，它就容許有反例的存在，因而以經驗反証要反駁馬爾薩斯便難

以成立。實際上也是如此，馬爾薩斯**人口論**一書的原文中，並不是用「公式」來表達此一意涵。首先，馬爾薩斯先設定兩個假設（*postlata; postulate*）：

- 一、食物是人生存之所需；
- 二、兩性激情是必要且始終造成影響的；

根據這兩個假設，馬爾薩斯才進一步推論說，人口增長遠大於食物增長，因而將造成戰爭、飢荒等問題。⁴⁹由於這兩個假設之所以成立，乃是因為它是「法則」(*laws*)；而依此假設所推演出的結論，馬爾薩斯則稱之為「原理」(*principle*)。如果詳加了解英國當時這些字詞的用法和原意，便可知，馬爾薩斯並非把他的人口觀點看成是一成不變的公式（*formula*），*law* 和 *principle* 二字，在當時並非有如當代所理解地那麼具有普效性和一致性，反例只要是少數而非常態，都是可容許的。在「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此一概念尚未出現的時代中，更進一步說，當政治經濟學尚未從西方傳統倫理學（*ethics*）的範圍脫離出來時，各種現代社會科學所沿用的舊有字詞，必須還原到當時時空脈絡的文化意涵當中來理解才是恰當的。這個道理，連恩格斯都曾用不同的方式強調過，因此，這樣的理原應可為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⁵⁰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論是張培剛或者是馬寅初，在這個問題上，都有同樣的傾向，即對於這些詞意產生了理解上的偏狹。

另一種反駁方法，便是從範疇之間的內在關聯性進行破解。以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為例，其立論的基礎即把「人口」與「糧食」這兩個範疇對立起來，即人口多就會更多地消費糧食。這一組對立的範疇，可以說是馬爾薩斯對當時社會所進行的合理抽象，要打破確實困難，因為此一組範疇之間的內在關連性並非人為主觀臆想，而是奠基於現實的關聯網絡之中：人必須消費糧食才能存在，因此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而且在糧食作為一定數時，人多便代表糧食變少，反之亦然。既是如此，此一論點在邏輯上似乎就毫無破綻了。通常的反駁方式便是把「科學」此一範疇加入，強調科學引入農業生產之後，糧食產量將可打破等差級數，人口與糧食的關係便不會像馬爾薩斯所說的那樣，糧食增長不但可以趕上人口增長，甚至能超越人口增長，因為科學此一範疇，賦予了糧食增長的無限可能。這樣的批評方式，相對於經驗反証來得具有說服力，不論是馬寅初，或者是其他批評馬寅初的人們，大都用此一方法，包括孫中山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再不然便是把科學代換成「發展生產」，毛澤東在「唯心主義歷史觀」一文當中，也有此一說。⁵¹但這樣的方式仍未能推翻馬爾薩斯理論本身的預設前提，即人口

⁴⁹ Thomas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London: Inst. Paul's Church-Yard, 1798), P. 3.

⁵⁰ 詳見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中解釋洛貝爾圖斯（Jagetzow Rodbertus）與馬克思理論的差異。

⁵¹ 當然，發展生產不一定就是用所謂科學的方式，因為這裏所說的科學，也不是一般的廣泛意涵，而是指「科學投入農業生產」，具體來說便是土壤學、農業化學（肥料、農藥）、農業機械等。合理的管理方式改進和生產組織的調整，在當時「科學管理」的概念尚未出現時，是不包含在「科

與糧食的對立關係。科學或者發展生產，可以作為此二者之間的中介，使這一組對立的範疇不那麼對立，但二者之間的關係依舊是對立的：只要是人，就是要吃糧食、消耗糧食，因此，只要人多，消費就多。另一方面，科學投入農業生產，在馬爾薩斯的時代還並不多見，土壤學和農業化學都是比馬爾薩斯稍後的時期才出現的學科，因而用科學來反駁馬爾薩斯的理論，雖然不能說是錯誤的，但卻是後見之明，因而是超歷史的。人們在評論自然科學的進展時，不易會有超歷史的觀點出現，沒有人會把今日的直升機造型作為範本去嘲笑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手稿中的飛行器模樣，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中，卻往往如此，像是對馬爾薩斯對於科學的認知便是如此。

那麼，既然人口與糧食的對立是真實的，要在邏輯上突破此一論點就變得幾乎是不可能，除非重新理解人口與糧食的基本關係，即思考人口與糧食之間的關係，除了對立性之外，是否有其它關係的存在，因而使得人口與糧食的關係不只是對立的，而是有著其它可能性。

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在邏輯關係中使得人口與糧食的關係不只是對立的，還有相生相成的一面，其實是張培剛所提出的「人手論」論點。「人手論」的重心，就如張培剛在 1957 年所提出的那樣，「不能只看到積累和人口作為消費者的關係一面，而忽視了積累和人口作為生產者的關係一面。」如此一來，情況就有所不同。只要既定人口數所生產的糧食多於其所消費的糧食，那麼，人口與糧食的關係便有相生相成的效果。張培剛提出，人口與糧食的關係有三種情況：

一種是增加的人口所創造的勞動，只夠自己消費，沒有為社會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不增加積累；再一種是增加的人口所創造的勞動，除了為自己的產品外，還有為社會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增加一定數量的積累；還有一種情況，是增加的人口所創造的勞動還不夠自己的消費，在這種情況下，就會減少一定數量的積累。實際上，這三種情況都會發生，但就整個社會來說，特別是就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第二種情況是主要的。

像張培剛這樣，把人口與糧食的關係不僅考慮到消費領域，還將其拉進生產層面來看待，那麼只要人類的生命樣態還是必須從自然的動植物當中獲取糧食，從而只要糧食生產始終必須透過人類自身進行生產，而不是走向完全的自動化，那麼「人手論」就始終是有效的說明：人口的增加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代表著糧食生產力增加，從而就是糧食增加的保證。人口與糧食這兩個範疇被馬爾薩斯置入消費領域中，就註定了這兩個範疇的對立性，從而難以打破。一旦被張培剛等人置入生產領域中，人口與糧食才有可能相生相成。

學」的理解當中的：「科學」一詞在中共的學術氛圍中，仍只被嚴格地限定在自然科學領域內，儘管馬、恩二人早已宣稱自己的主張是「科學社會主義」。

張培剛提出的「人手論」，不但讓日本人指稱中共為「人手論」者，同時這樣的觀點也成為了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報告中關於人口與糧食關係的基本論點。

劉少奇把那些將人口與糧食只置入消費領域看待的理論，都看成是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但是，這樣的看法是極片面的。如果相較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傳統而言，馬克思的確較為注重生產領域的經濟分析，但是這並不表示消費領域或流通領域不重要，尤其在關於剩餘價值的實現問題上。另外，同一經濟作為可能兼有生產和消費這兩種作用。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一文中，馬克思首先整理了亞當斯密、李嘉圖和彌爾的政治經濟學論點，釐清生產、消費、分配與交換的基本關係。在他看來，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始終沒有好好整理這些經濟範疇的基本關係，致使在很多問題上產生誤解。以生產和消費的關係而論，直接從生活體驗出發，往往會得出生產與消費的對立：生產是創造性的，消費則是純粹的消耗。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馬克思認為生產也是消費，因為生產必須消費生產資料如工具、原材料等；而消費也是生產，因為人在進行消費的同時便是在生產人類的身體和體腦能力。因此，生產的目的在於消費，但沒有生產便無法消費。生產與消費的關係並非一組純然對立的關係。⁵²因此，把注重生產領域與否看成是理論上判別為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標準，從而在概念上把生產和消費一刀切，在中共當時看來或許是流行的、重要的，然而實際上卻是片面的、經驗主義的。

其次，張培剛原文的意思當中，雖然較為強調了人口的生產力，但從他提出上述的三種可能性而言，他是同時注意到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張培剛等人會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二種情況，即一定人口數的糧食生產大於消費，會是主要的呢？

要使一定人口數的人口生產糧食大於消費，就必須以一定的勞動生產率為前提。換句話說，除非張培剛提出證據，說明社會主義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就算不高於資本主義國家，至少也要高於中共建政之前，並且足夠支應六億人口的消費而有所剩餘，同時剩餘量和剩餘率都是與時俱進的。張培剛的確有這麼做，其論證方式是，以人口增長率和糧食增長率相比：

1949年糧食總產量為2200億斤，1952年為3350億斤，1954年為3390億斤，1955年為3480億斤，1956年為3680億斤，增加的速度也大大超過了人口的自然增長率。目前，我國6億3000萬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攤

⁵²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93-94。

得糧食 580 斤。按照由「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要求，到 1967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將增到 8385 億斤，即使我國人口按 20‰或 25‰的自然增長率，到 1967 年增加到 7 億 7000 萬或 8 億 4000 萬，平均每人每年將攤到糧食 1000 斤或 1000 多斤，比過去還大大有所提高。除了提高每畝產量外，再加上開墾荒地，適當地向西北和西南地區移民，生活資料的增長速度還要大些。在今天的中國，即令過去在經濟和科學方面很落後，如果還說工農業生產增加的速度是算術級數的，那是缺乏事實依據的，也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經濟規律的。

從上引的資料來看，張培剛的算法不能說是錯的，但是有取巧之處。他提出 1949 年糧食總產量為 2200 億斤，到了 1956 年為 3680 億斤，1949-1956 年 7 年間，糧食增長了近六成，增加的速度也大大超過了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按馬寅初的估計，人口平均年增率 20‰）。如果我們把這七年間增加的六成糧食，按年份平均，將會發現，實際上糧食的平均年增量有 240 斤，平均的年增率有 10% 左右，的確遠大於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但是，如果我們注意到，在張培剛所引的資料當中，1949-1952 年間糧食便從 2200 億斤增長到 3350 億斤，而 1952-1956 年間只從 3350 億斤增長到 3680 億斤，顯見前三年的糧食增產和後四年的糧食增產，速率大不同。而人口的增長率雖然也有此一類同的趨勢，但相對於糧食的增長情況而言，各年份之間的差異顯得小很多。就糧食的部分來看，究其主要原因，前三年恢復得快，舉世皆然，戰後恢復期原本就會比較高速度。當然，中共的土地政策（包括土改、開荒等）多少也發生了一些增產效應。但是，這些效應明顯地從 1952 年以後便大幅消退，若以後四年的年增率計算，四年間糧食只增長了 330 億斤，平均每年只增長 8、90 億斤，年增率更不到 3%，這與平均 20‰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年，相去就不遠了。如果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長所多出來的糧食消費，這樣的純糧食增長率，不要說有所積累，要全面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都有困難。

其次，還要考慮到積累率。這些增產的糧食，有多少比例會用於生活性消費直接改善和充實人民生活，又有多少比例會作為工業發展的積累呢？按馬寅初的提法來看，中國大陸當時的積累率是 21%，換句話說有 79% 是直接作為消費。如上所述，1953-1956 年的增長率已大幅縮小，如果再增加積累率的比例，那麼，人民生活的改善就更不可能了，甚至會產生倒退的情況。綜上所述，張培剛所說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二種情形是主要的」，並以 1949-1956 年的統計數字作為分析依據，其結論並不能真正有效支持他自己的論點。更何況 1958 年以後，中共為了因應大躍進的情勢，積累率大幅提高，甚至在先後接獲各地傳來增產捷報的情況下，一度提高到 33%，但是這些增產的數字，卻是建立在許多放衛星式的浮報數量上，大躍進的災難由此而生。

綜上所述，三馬之間的這筆帳，可以總括如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思

想方法，對馬寅初和張培剛等人而言，都是在此一論戰中的是非標準，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則是此一論戰過程當中的反面代表。誰能證明自己的論證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是反對馬爾薩斯主義的，便是正確的，反之就算不是反革命，至少也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細究二者之間的論證過程和方法，其實都有其一定的片面性，而這本來也是任何時代的科學、學術論爭當中情理之然。在史達林時期所編排的關於唯物辯證法的教科書，乃至於**資本論**的中文譯者王亞南所撰著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書，開宗明義都強調人非萬能，每一個時代，即始天縱英明，其認識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原因不僅來自於其所處的時代的社會文化發展情境，同時也來自於人體感官上所造成認識上的侷限性。然而在這場論戰當中，尤其是那些自詡為馬克思主義的詮釋者代表們，卻往往忘記了這個最為基本的問題。

其次，就論戰雙方的攻防而言，馬寅初理論上的片面性，攻擊者始終沒有放過，馬寅初的確也因此數度修正自己的用語，強化自己的論點，不過效果並不大，基本論點並無變化。相對的，馬寅初對於這些攻擊者的論點，始終是採取守勢，而沒有論證上的攻勢：他只是一再用不同的方法企圖證明自己的理論不是馬爾薩斯主義，但是卻從未直接攻擊對方論證上的片面性。因此，1980年代以後，真正能找到馬寅初直接批評對手的話，只剩下兩句，一是「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刀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批判者投降」，一是「有人稱我是馬爾薩斯主義者，我則稱他們為教條主義者，反列寧主義者」。然而這些批評，豪氣甘雲，正氣凜然，但畢竟沒有論證，只是回敬對手的政治控訴。究其原因，可能性有兩個：

- 一、是馬寅初並未發現對手們的弱點，或許是因為一心防衛而疏忽，或許是自己的理解程度上要看出對方的弱點有困難——畢竟我們看到馬寅初所列出的那些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書單（詳見下一章），儘管有許多是俄文原著，但是其中卻沒有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主要著作，大多都是二手詮釋，在質量上明顯不足，更重要的是，馬寅初所閱讀的這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鮮少有關於方法論的討論。
- 二、是內容之外的考慮，即這些與之論戰的人，其出身背景、政黨色彩、與各級黨委之間的關係，甚至這些人的寫作動機和背後所代表的政治高層力量等等，可能也是馬寅初所考慮的問題。若此，即使馬寅初對馬克思主義的造詣很高，能把**資本論**倒背如流，也不一定就會指出其理論上的片面性。

這就回到本章一開始的問題：到底在決定這場論戰的是非對錯的標準，是權力還是真理。筆者認為，上述這兩種情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作用，使得馬寅初在這次論戰當中，採取了我們所看到的表現形式。關於前兩種可能，即論戰本身的

真理性討論，已如上述，至於第三種可能，即此一論戰雙方的社會政治地位和權力關係，則必須放寬視野，考慮到這樣的問題：像馬寅初這一類的知識份子，到底跟中共的關係為何？關於這一點，將留待下一章討論。

